

回族社区的复兴与社会移动、社会福祉：以实证研究为基础
**Revive of Hui communities and Social Mobility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郑南(ZHENG, Nan)
吉林大学(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ui, an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is featured with its Islamic faith and wide distribution in China.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i in China's histor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lamic faith, which is deeply believed. Although "acculturation phenomenon" of the Hui has appeared with a blending of the Chinese mainstream culture, the Hui has formed into a great variety of traits in various places of China. However, the Muslim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er of the Hui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m going through all kinds of hardships and makes them exist for a long time. In this paper, first is to backtrack the—origi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feature of the Hui in China's history. Second is to focus on describ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the Hui of China face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market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beginning from 1978. Specifically, take two communities as case studies. One is the Hui community in the rural village of B in Baoshan of Yunnan province, the other one is Muslim community in Yiwu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change and formation of the two communities in the trend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new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Hui communities.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urrent of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cause two phenomenon. On the one hand, the Hui community in urban areas are facing the collap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ui, good at migration in the trend of market economy,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revive their ethnical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 and globalization, the Hui is mingled with disintegration and revival. How the Hui of China will survive and develop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thought seriously.

Key words: Hui, muslim, acculturation, market reform, mobility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个民族也在经历着本民族的变迁。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回族因为它的伊斯兰教信仰也因为它在中国的广泛分布以及悠久的历史而特别得到了学者更多的关注。但是关于回族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多为回族作者的作品,相对缺少从第三者观察的视角,这不得不说是关于回族研究的一个缺憾。而这篇论文是尽量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考察作为少数民族的各地区回族的特点以及与社会移动、社会福祉的关系,同时也通过对于各地回族社区的考察试图加深理解中国多元社会的特征以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对应与变迁。

作者于2009年12月至2013年2月间走访了云南省保山市、福建省福州市、上海市、山东省济南市、辽宁省抚顺市、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陕西省西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及北京市等地的清真寺,主要以对清真寺阿訇以及回族群众访谈的方法考察各地清真寺以及回族社区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深入到门宦制度曾经非常发达的

西北各地的清真寺进行调查，关于西北地区的回族社会多依赖现有的文献。本文的第一节将概括地介绍回族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特征及发展现状。第二节以在各地的调查为基础介绍在市场经济下受到严重冲击的清真寺以及回族社区的现状。第三节以云南保山市 B 村的事例来探讨在改革开放后回族社区的变化及其特征。在第四节中以浙江义乌的事例来考察在全球化与市场化条件下穆斯林文化的传播及对于中国地域社会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回溯及事例调查初步探讨回族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境遇及其自身的对应，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增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巨大国家及其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理解。

1 回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变迁以及文化特征

回族是历史悠久而且在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之一。自从 1950 年代正式被中央政府认定为少数民族以来，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回族人口已经达到 982 万。回族有“大分散、小集住”的特点，分布在全国 2000 多个市与县之中，所以有“回回遍天下”之说。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而在在边疆地区，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回族有在城市居住的倾向，而且回族聚居区多分布在城市繁华地带，这与回族自古擅长做生意经商有很大的关系。汉语是回族的第一语言，但是在他们使用的语言中也夹杂很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单词，而且根据地区不同也稍有不同。

关于回族是怎样产生的，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 7 世纪中叶很多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商人从海路与陆路到达中国的广州、泉州以及内陆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贸易，其中很多人定居下来。另一个路径是在 13 世纪蒙古帝国入侵中国时从中亚地区带来了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也就是说现在的回民很多是这些伊斯兰移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通婚的后代，而在这之中发生了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现象。时至今日很多回族虽然不懂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伊斯兰信仰还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坚守能够使回族在强大的中国汉文化中生生不息。

回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尤其是清朝末年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族起义同时也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笔者在云南保山市作调查的村庄在那时就遭受到了清军的大屠杀而只有数人逃出幸存，原本全是回族的村庄里现在只剩下几十户而大多数是汉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在 1950 年代的“民主改革”与 1960 年代的“文革”中，各地的清真寺也都遭到很大的破坏，很多阿訇也被迫走出清真寺。¹1979 年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各地没有被破坏的清真寺重新开放，同时又有很多新建的清真寺。与传统的四合院式的清真寺不同，新建的清真寺往往具有与中东阿拉伯地区相似的拱形结构。这种结构的清真寺造价比较低而且容量大，也适应了当今到清真寺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的需求。

回族之所以能够在残酷的外界环境下生存下来，不光是因为对于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也在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吸收以汉民族为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有学者认为回族文化是一种二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是将汉民族的儒教文化与伊斯兰教相互融合的产物（马启成、丁宏 1998:72）。在人类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涵化（Acculturation），当然在这种涵化之中伊

¹ 抚顺清真寺的一位阿訇就是在 1950 年代的“民主改革”中被赶出清真寺后成为了一个钢铁厂的工人，后来随着支援东北建设而到了抚顺。

伊斯兰教的思想始终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比如，在山东省小金庄作调查时了解到，当地的回族虽然很重视孝的观念，但却是否定祖先崇拜的。这里的回族也会在人死后七天、四十天、一百天、一周年及三周年的时候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而且跟汉族人一样，回族也有自己的家谱，这明显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不管他们的生活习惯怎样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回民还是笃信伊斯兰教的，尽管他们的一些宗教文化在形式上已经与中东阿拉伯地区很不相同。因为回族散居在中国各地，所以各个地区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回族与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制定的关于回族的各种管理制度中获得启示。在唐宋时期，为了管理那些到中国做贸易而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伊斯兰教徒，政府特意制定了“蕃坊”制度来管理这些外国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放而具有宽容精神的时代，唐朝政府对于这些从外邦来的伊斯兰教徒是友好的也希望这些蕃商能够通过商贸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这些逐渐移居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也因为聚居到蕃坊也从文化认同上找到了归宿。唐宋时期，蕃商比较集中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宁波以及内地的西安、开封等城市都形成了蕃坊。由于唐朝政府的宽容，蕃坊虽然是政府规定的制度，但在内部却是比较独立自由的。宋朝也基本上延续了唐朝的政策。霍维洮因此（2005：145）认为回族社会从形成时代起就具有双重性。「蕃坊首先是唐宋王朝设置的制度，而不是来华蕃商独立形成的组织；但蕃坊内部又实现了蕃商等侨民的自治，不同于唐宋统治下的其他的地方组织关系。」

蒙元时期是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的时候。由于成吉思汗子孙三次西征，被迁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工匠与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是中国回族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前锋。后又派去镇戍边关要塞，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马通 1989：119）。而在元明以后，唐宋时期的蕃坊制度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转变为“教坊”制度，在这种转变之中政府加强了对于回族的统治使其置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之下。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政治法律裁判权归于政府，教坊变为单纯的宗教组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自治性，即使事实上仍存在坊内居民自我管理，也不为政府所承认。这一时期，政府还极力影响和控制教坊事务，例如修建清真寺也需要政府批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回族逐渐失去了自治权，而且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也相互孤立而分散。

马通（1989：120）认为元末明初是回回民族开始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时期。他认为首先是久居中原的各族穆斯林已经具有大融合和形成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条件，第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强迫同化政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朱元璋一方面在东南沿海以背叛南宋杀害王室后裔的泉州蒲寿庚家族为重要对象对穆斯林实行镇压政策。这迫使东南沿海的穆斯林大多逃离他乡而几乎绝迹。同时，朱元璋对于内地的穆斯林一方面实行迁徙疏散，另一方面下诏禁止本类婚配、禁止说胡语、穿胡服、用胡名，但同时又御制“百字赞”，敕建清真寺，表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马通（1989：121）认为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加速中原大地上的各族穆斯林的汉化，使其成为一个只是宗教信仰不同的“汉民族”。²事实上回族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压力被同化而消失，正是因为有内在的伊斯兰信仰相维系虽然相互不以回族对待还是以“回教”相称。但是从总体来说，教坊一直处于组织分散影响范围狭小的状态，这

² 这是一种观点，笔者在走访山东清真寺的时候还有阿訇认为明朝是尊重回族的。

也正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希望的。

而到了清末及清朝，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回族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西北回族社会不断壮大，经济文化趋于统一，区域性日益明显时，教坊的分散性和狭小性已经不适应回族社会的发展，于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由胡登洲（1522-1597年）首创的经堂教育就是这种变化的开始，它改变了以往阿訇培养父子相传的方式，使狭小的家传式教育转变为集中的社会化教育（霍维洮 1996:84）。顾名思义，经堂教育就是在清真寺的讲经堂里施行的一种宗教教育。经堂教育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小学。其中小学和中学比较普遍，大学则分布在穆斯林比较集中经堂教育发达的城镇，如清同治年间以前长安为经堂教育大学的集中地。同治年间之后，河州成为培养阿訇的主要地区。³经堂小学主要向穆斯林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伊斯兰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六大信仰、五项主命，并学会简单的阿拉伯语字母及其拼读，由此学会一些《古兰经》中部分常用的章节。中学教育的对象是从小没有受过系统宗教教育的成年人，学习主要内容是《古兰经选读》，时间上无严格规定，农村多在农闲时学习，城镇也多选择闲暇时间进行。大学里要系统学会《古兰经注》、圣训、教学法、哲学、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法、句法、修辞以及一些相关的天文地理知识。大学里的优秀学生毕业以后多被其他清真寺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訇。经堂教育的发达一方面培养了大量的穆斯林人才，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教坊的封闭性，推动了一定区域内教坊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了各种流派。

马通（1989: 122）认为清初以来在西北甘、宁、青地区产生门宦及其教团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是世界伊斯兰教派分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苏非派的传入，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依禅⁴和门宦产生的外部原因；第二，是天灾人祸，穷困苦难，是中国穆斯林崇信依禅和门宦的内在因素；第三，一些政治集团的利用和支持，是中国伊斯兰教一些派别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第四，地域毗邻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门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十七世纪末主张冥想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苏非学派教义传入了甘、宁、青地区。于是在发达的经堂教育及苏菲派伊斯兰教义这些条件影响之下就逐渐形成了以具有卡利斯的马的指导者为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门宦制度。甘、宁、青的三大派别与四大苏非学派（虎夫耶、嘎底林耶、库布林耶、哲赫林耶）又演化形成近四十个门宦。门宦共同的遵行的教义和礼仪是：尊信《古兰经》和圣训，并以“念、礼、斋、课、朝”五件天命为基本义务；崇敬教主、老人家，宣扬他们是引领教众走上正道的“筛海”（长老），教众必须遵从他的领导；教主、老人家须坐静修持，常念“齐克尔”；在教主墓地建立亭室曰拱北，教众须经经常去拱北悼念；大多数门宦的老人家、教主由始传者的子孙世袭，或由信赖的高徒继承，别人不能继承相传；教主管辖许多教坊（清真寺），教坊的阿訇由教主委任；教主老人家一般靠营商贸易和教众的奉献开展本门宦的宗教活动（马通 1989: 127）。当时的门宦制度不光具有教育培养本宦内宗教人才的功能，还在征收“天课”⁵、调停回族内部的纠纷以及指导回族的婚丧嫁娶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当时的门宦已经成长为了以卡利斯的马指导者为中心高度组织化的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

³ 河州被誉为中国的小麦加，现在仅临夏市就有八十多座清真寺。

⁴ 依禅一词来源于波斯语，是一种教派职位的称号，此教派由中亚传入新疆，主要形成白山派与黑山派两大派。

⁵ 天课（Zakat）一词是属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术语，是伊斯兰信仰的第四支柱。这是安拉（Allah）对那些丰衣足食的穆民的主命（fard），指令他（她）们把其每年盈余财富的一部份用作帮助贫民和有需要的人。

集团，它的成长因最终威胁到了皇权而惨遭镇压。但是门宦之间也因见解不同经常发生矛盾甚至争斗，这也是造成回族内部不团结最终反清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回族的发展到了清朝达到了影响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在回族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与主流社会如何相处的思想。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以儒释经”的运动，主要推动这种用儒家思想来解释伊斯兰经典的回族知识分子又被称为“回儒”。回儒主张二元忠诚论，既忠于真主阿拉又忠于皇帝，积极支持现有的政治体制，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保证回族安宁的目的。这种思想主要发生于回族人口相对少的东部地区，可以说一种与现有政治体制保持协调的主张。而在回族人口众多的西部地区，以哲赫林耶为代表的某些门宦却渐渐具有了脱离中央集权的倾向。他们「讨厌满汉的统治，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一有机会就会考虑脱离中华帝国（松本 2000：103）。」这些门宦最终走上与当时的清朝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而遭到残酷的武装镇压，他们可以被称为殉教的排斥同化派。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当时清王朝高压政策下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段继业 2001：25）。不管怎样，在历史上回族受到了残酷的屠杀与迫害。作为少数民族怎么与其他民族平安相处是重中之重，所以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人口较少也就出现了放弃伊斯兰信仰而被基本同化的现象。甚至在那些地区回族也跟汉族一样拥有“族祠”“族坟”“族谱”“族规”（王建新 2011：7）。对于这种被同化现象，其他地区的回族是扼腕惋惜的，但是如果了解了回族在历史上所面临过的困境，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擅长贸易与商业，传统上回族就有在城市中心聚居的倾向。比如济南南大寺附近的回族聚居区以及西安的回族聚居区都位于市中心⁶，就连辽宁抚顺的清真寺也位于繁华商业区附近，尽管在解放后大批回民迁移到全市各地。有学者指出，传统城市内回族社区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在地理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结构是其最大的特征。特有的经堂教育兼具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是保证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而在经济上多采用行会制经商，在婚姻结构上多采用内婚制也是防止本民族不被同化的考量（周传斌、马雪峰 2004：34）。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强韧的结构，回族人能够相互支持而又不被周围大多数的汉族人所同化。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在城市中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功能在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的冲击下虽有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可见它的强韧性，而对于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是维持这种强韧性的最重要支柱。

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完完全全的外来文化，从移民到几百年来与中国社会的融合，中国各地的回族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了微妙的区别。但是在伊斯兰信仰这一本质问题上是他们相通的，这也是回族及其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回族也在经受着猛烈的冲击。在云南，很多地区的伊斯兰学校的老师都有到过西亚地区留学的经验。在抚顺市的清真寺，每个周五都会有几十位来自西亚及非洲地区的外国留学生来做主麻礼拜。全国各地的回族教众每年也都争相向当地宗教管理部门申请争取去麦加朝圣以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在中国宗教政策落实以及市场化与全球化等大环境的变动之下，中国的回族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变动。从传统上回族就是善于移动善于在市场经济中抓住机会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很多回族也成为了最先富裕起来的人。可以说，整个时代环境的变化为回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在笔者在全国

⁶ 济南回族聚居区一直面临着城市改造的压力，但是由于南大寺教长的努力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各地的走访中得到了深深地体验。当然在这种回族文化的复兴之中，是以尊重中国本土回族文化独特的发展历程为前提，还是直接移植中东阿拉伯地区所谓更纯粹的伊斯兰信仰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关于这些，清朝末年惨痛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

2 市场经济冲击中的回族社区与清真寺的现状

自古以来，清真寺就是回族社区的中心，考察清真寺的变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整个回族社会的变化。清真寺一般由礼拜堂、经堂与水房（沐浴房）构成，在农村地区新建的清真寺往往比较简陋但也具备最基本的条件。虽然由于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福州、济南、沈阳、西安、长春，北京（牛街）等地传统四合院形式的清真寺被保留下来，但有很多其他地区的清真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和新建的清真寺一般多采用拱形样式的建筑模式。比如于 1932 年建成的抚顺市的清真寺原是传统四合院样式的，历经岁月的洗礼面临倒塌于是被完全拆毁，而在 2004 年新建的清真寺采用拱形建筑模式，主要再建资金由当地回民自己筹集，市政府也以落实民族政策为名援助了 50 万元。⁷在抚顺新建的清真寺中一楼是沐浴室，二楼是男用礼拜室及阿訇办公室，三楼是女用礼拜室及教室。这种新建的清真寺使用面积大，对于一般来礼拜的回族群众也很方便。



抚顺清真寺

大连的清真寺也跟抚顺一样是再建的，老寺始建于 1922 年，1925 年竣工。“文革”中清真寺被关闭，1979 年落实政策后开始重新修复。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89 年 4 月大连新寺工程破土动工，经过 18 个月的修建，于 1990 年 10 月 28 日正式落成。新清真寺占地面积 1.8 亩，外观壮丽，为阿拉伯拱形建筑风格。门厅的顶部中间是绿色的大圆顶，圆顶上端装饰有一颗象征伊斯兰教特征的月牙。新清真寺落成后，为了搞好清真寺的“自养”，以及为国内外穆斯林来大连提供食宿方便，该寺设有“民族饭庄”，内含旅馆部、餐厅部。清真寺经济自养有余，这也是大连清真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也跟大连处于市场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有一定的关系。笔者也发现大多数新建的清真寺多采用这种具有浓厚阿拉伯色彩的

⁷ 此数据来源于对于阿訇的采访。

建筑方式。上海 2010 年新建的江湾清真寺气势宏伟也是采用拱形阿拉伯建筑风格，清真寺内部使用面积很大，成为了很多从外地到上海做生意打工的回族群众做礼拜及相互交流、休息的场所。⁸这种建筑风格的变化当然有其重视实用性的一面，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中东阿拉伯地区影响的结果。



上海江湾清真寺内

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很多清真寺重新开放、重建及新建。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传统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回族社区很多都已经消失，很多回民也已经迁移到了其他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也由于传统回族社区多集中于城市中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中心地带，所以在城市再开发的浪潮中传统回族社区经受到强烈的冲击甚至面临着消失的危机。比如济南市郊外的小金庄回族社区就面临着整体搬迁的问题。小金庄清真寺始建于明朝（1490年），规模宏大，大殿建筑面积 350 平方米。1999 年原位置重建，最后一次修缮在 2009 年。殿前有大型影壁，南北长 15.7 米，壁顶为宫殿式。1996 年在清真寺南侧新建清真女寺一座，建筑面积 50 平方米。两寺总占地面积 445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70 平方米。该寺坐西朝东，由大殿、后殿组成。大殿、后殿两侧山墙均有壁画。殿前悬挂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金宝珍、丁文方的题词匾额。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小金庄清真寺也是极具特色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但是，小金庄整体搬迁后清真寺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也是很难预测，最坏的结果就是在搬迁之后整体回族社区将不复存在。

位于长春市南关区的清真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一座在 1824 年由回民捐资创建并于 1852 年迁址到现址的清真寺，是中国传统的宫殿式砖木结构建筑，后经过几次扩建和政府出资修缮，在 1987 年被认定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长春市唯一遗留下来的清代古典建筑群，但就是这样一座清真寺也因为周围社区的搬迁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即使是因为政府的援助使清真寺自身得到修缮，但是周围回族社区因为整体拆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消失，这也是很多城市清真寺与回族社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寺坊结构的解体。其实大连和抚顺市的清真寺寺坊结构已经解体，周围的回族居民大多已经搬迁到其他地方。

⁸ 上海江湾清真寺于 2010 年建成也是因为上海世博会的影响，因为考虑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会到上海参观世博会。



长春的清真寺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清真寺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相对发展比较迅速的东部地区。怎么保护这些回族社区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济南市的南大寺是一组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大型伊斯兰教建筑群，为中国伊斯兰教早期著名的清真寺之一，也是济南市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清真寺。据说此清真寺于元代元贞元年（公元 1295 年）迁至泺源门西、锦纆沟东的今址。明正统元年（公元 1436 年）修建院墙和礼殿，弘治七年（公元 1492 年）扩建大殿、立南北讲堂、僻静所、沐浴室等，寺门朝向也由南改为东，后明嘉靖、万历，清嘉庆、道光、同治及民国初年多次整修扩建为现状。文化大革命中该寺曾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经书、碑刻、匾额、楹联、文物被毁，宗教活动被废止，阿訇遭批斗，礼拜殿被改作工厂车间，并存在乱拆乱建，直到落实宗教政策后由多方斥资整修。据笔者对于清真寺教长的采访，由于此寺位于市中心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所以也有被动员拆迁及再开发，但都遭到清真寺的拒绝而能保存到现在。有学者已经指出，「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各城市大规模搬迁改造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回族群体和其他民族群体一样，从平房搬入楼房，生活在周围的不再是单一的回族穆斯林，而是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杨华 2012：64）。」市场经济的冲击力及诱惑力是巨大的，在面临这种冲击的时候清真寺及回族社区区能否抵御得住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济南南大寺

即使是在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作为回族社区中心的清真寺还是在起着多方面的作用的。首先，清真寺还是回族社区的中心，是回族居民做礼拜的场所也是他们交换信息甚至是举行社区选举的场所。笔者在西安作调查时就目睹了一场在清真寺内举行的社区干部选举。第二，各地的清真寺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救济贫穷回族人口的功能。回族群众都有向清真寺捐天课的传统，而这些被捐助的善款不光用于清真寺的建设上也会有一部分用在救济贫困回族人口上。第三，各地的清真寺也是传承回族传统及伊斯兰文化的场所。比如在云南省保山市 B 村的清真寺中，每年夏天都会以村内回族儿童为对象开展包括补习文化课及讲解古兰经的活动。这种活动主要由伊斯兰学校的学生以志愿活动形式展开，而费用则由村里富裕的回族捐赠甚至免费给学生提供午餐。在抚顺的清真寺在每周五做主麻之前也会举办由阿訇主持的关于可兰经的讲解。第四，清真寺是对所有穆斯林开放的场所。对于那些从西北移动到东部地区做生意的回族及其他穆斯林来说，清真寺是休息及获得信息的地方。也是在这种信仰虔诚的西部穆斯林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移动的过程中，对于东部当地的穆斯林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由于西部回族的教派观念比较重有时也会阻碍与当地回族的社会交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各地的回族社会都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城市里，很多退休的回族群众把清真寺当成了与别人聊天交流、颐养天年的场所。在北京的牛街清真寺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还会热心地为你介绍清真寺的历史和现状。这种现象在很多清真寺里都有存在。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是，笔者在东部的一些清真寺都发现有汉族人入信伊斯兰教的现象。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与回族通婚而入信的，少数也有自己入信的例子。在西部地区，对于与汉族的通婚很多回族人还是持反对的态度。比如在西安清真寺作调查时，一位回族中年妇女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自己的子女与汉族通婚而极力坚持同族内通婚。但是在东部地区，与其他民族通婚已经成为了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为了对应这种民族间通婚增加的现象抚顺市清真寺在 2012 年 12 月还专门制定了《抚顺市清真寺归依制度》，使汉族人等入信伊斯兰教有了一个规程。这个制度规定如下：1、凡要求归依伊斯兰教者，本人必须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并写出书面申请交到寺管会；2、至少有两名为教门的男性穆斯林或一名男性穆斯林和两名女性穆斯

林作介绍人；3、寺管会负责教务的主人定期主持召开由寺管会成员和阿訇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研究申请人的入教问题；4、被批准入教的人还要张榜公示听取教众的意见和反映；5、由阿訇组织被批准入教人员学习教门知识、做大净、教念清真言、做证词，至少做一次礼拜；6、完成了上述程序后由清真寺管委会向被批准入教人员颁发归依证书。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流动以及与外族通婚的一般化等现象已经不得不使当地的回族穆斯林做出一些变通，而这些变化通常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回族社区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改造中，一些传统的回族社区面临衰落与解体的危机。在明朝初期形成的南京著名的七家湾回族社区已经在城市拆迁改造中濒临瓦解，而这种现象可以说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历史上回族就有很高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而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当今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些回族人越来越对本民族的文化及其发展倾注自己的力量，而这又成为了回族伊斯兰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而就是在这种危机与机会相互交错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族社会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又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下面将介绍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复兴回族文化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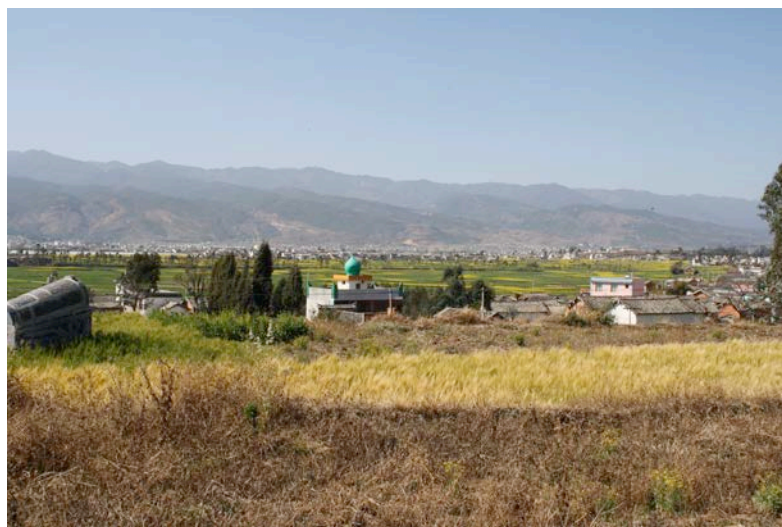
3 市场经济条件下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以云南保山 B 村清真寺为例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回族社区特别是城市里的回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状态，这在前一节里已经用一些实例作了介绍。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农村特别是传统上伊斯兰信仰虔诚的西北和西南地区，以清真寺为中心回族社区也有复兴的倾向。这种回族社区复兴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全球化条件下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大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中获得发展的中国回族逐渐具有了复兴本民族文化的实力和意识。对于回族社会可以说市场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两方面的，既带来了危机也带来了希望。下面就以云南省保山市 B 村为事例介绍一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回族社区复兴的具体情况。

保山市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东与大理州、临沧市接壤，北与怒江州西与德宏州毗邻，西北、正南同缅甸交界。保山市由隆阳区与腾冲、隆陵、施甸、昌宁四个县以及 72 个乡镇、街道构成。2008 年人口为 248.22 万人，其中彝族、白族、傣族、傈僳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37 个(2001 年)人口 24.98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10.06%(2008 年)。回族人口在 2001 年为 1.27 万人，而到 2008 年略增到 1.34 万人(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 2009: 29)。B 村是保山市隆阳区 J 乡 Y 行政村下的一个自然村。Y 行政村在 2006 年人口为 5358 人，由 15 个村小组构成。根据 B 村老干部的介绍，B 村由 Y 行政村中的 3、4、5、6、7 的村小组构成，而回族基本上集中在 7 组。现在回族 33 户人口约 130 人，其中姓赛与姓沙的各一户以外都姓张。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 年)九月初二，由于清朝地方官府的“助汉抑回”政策保山发生了著名的“永昌惨案”。虽然起义领袖杜文秀侥幸脱险，但在惨案中城内 4000 多人被杀，全部死亡人数达 8000 多人，52 个村寨被踏为平地，这其中也包括杜文秀的全部家人。B 村也没有幸免，只有一个张姓回族从保山逃到缅甸，村内清真寺也被毁坏。公元 1872 年末，杜文秀起义失败在大理城服毒自杀后，整个保山的回族又遭到毁灭性屠杀，死亡人数达 10 万多，只有少数外逃。这个张姓回族终于在逃亡几十年后回到故乡，而 B 村的张姓回族据称都是他的后代。而据村里的老人说，在永昌惨案之前 B 村基本上都是回族。

在 B 村现在有一个清真寺，而对于这个清真寺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的是张 XZ。张 XZ

是本村人，五十多岁，小学毕业，是在保山与昆明经营回族饭店的老板。张 XZ 的生意越做越大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也得益于本人的经营能力。改革开放后，张 XZ 就离开了农业开始了贩卖牛的生意，后来又把精力放在经营回族饭店上，现在保山有两个店昆明有三个店。也正是因为这个张 XZ 的大力支持，才使得 B 村能够在 150 年后重建清真寺。为了重建清真寺，村里回族也都有捐款但大部分还是张 XZ 出的资。1990 年在向政府申请重建清真寺得到批准后，终于在 1994 年 12 月 18 日建成了现在的清真寺。清真寺总投资 14 万元，占地 1.1 亩，包括大殿厢房和仓库等总面积达到 393.3 平方米，而在清真寺的复建过程中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新清真寺建成前，村里的人都是到很远的 B 镇的清真寺做礼拜，如果遇到雨天的话道路非常泥泞不方便通行，而新清真寺建成后大大方便了 B 村的回族群众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妇女。



村中的清真寺

在 2011 年调查的时候，清真寺里有两个 20 多岁的年轻阿訇，一人来自云南施甸一人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两个阿訇都是经人介绍最后由张 XZ 决定任用的。前者还曾经在张 XZ 经营的饭店工作过，在云南玉溪受过经堂教育而从 2009 年开始就住到这个清真寺。后者毕业于经学院从 2010 年起与妻子一起到了这个清真寺。清真寺的经费都是由张 XZ 一个人提供的，一年要几万块。张 XZ 还从经济上支援清真寺的教育活动，还给到清真寺学习的孩子们颁发奖学金。对于本地著名的回儒马注⁹迁坟以及发起回族文化研究会张 XZ 也给了不遗余力的支援。甚至对于村里的残疾汉族群众张 XZ 也慷慨捐款帮助他们盖新房。村里的清真寺是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的，这也是张 XZ 的想法，每年夏季与冬季的假期都会有省内的回族大学生或者中专生到清真寺里支教。2010 年 3 月作调查时，大理穆斯林专科学校的两个学生正在清真寺里支教，一位 16 岁来自新疆另一位 19 岁是大理人。他们在给村里的回族儿童补习文化课的同时也会教授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其实这有些教育活动有些与经堂教育的小学相类似。孩子们要在清真寺里从早上学到下午，中午还可以在清真寺里免费吃饭，当然这些费用都是由张 XZ 提供的。

张 XZ 不光在重修清真寺普及伊斯兰教育上是个关键人物，也是 B 村整体的一个重要人物。

⁹马注(1640~1711)，回族，经名优素福，字文炳，号仲修，晚号指南老人。中国清初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保山人，清代云南第一位穆斯林学者，中国四大回儒之一。

2009年，张XZ用25万元购买了村里的一块土地，包括银行贷款在内共投资500万元着手建设四层楼高的“农家乐”。为了使到农家乐的道路通畅，也开始建设直通邻近B镇长800米宽8米的道路。为了修建这条路张XZ已经投入了20万元，同村出身的建筑队汉族老板也投入了20万元。不光如此，2009年为了把村内的土路铺装成水泥路张XZ也捐助了10万元，汉族建筑队老板也提供了相当于10万元的沙子。有意思的是，这些有关B村基础建设的事并没有Y行政村的参与，基本上是以张XZ及汉族建筑队老板为首自己决定了。由他们捐助的道路建设费也是托付由B村的老年协会来管理，建筑队也是老年协会自己找的。B村老年协会现有60岁以上老人会员187名，其中13名是回族。老年协会的基本活动经费基本来自协会所有的山地与农田的承包费。可以说张XZ与老年协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信赖关系，为了老年协会办公室的翻修张XZ也捐了很多钱。2010年2月9日春节还举行了竣工仪式，而宴会费用也是由张XZ及汉族建筑队老板提供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B村已经形成了某种原生态的自治，而经营回民饭店的张XY以及老年协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B村的道路建设之中Y行政村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从总体上讲，由于回族很能在市场经济中抓住机会，所以像张XY一样村里的很多回族也在外边做生意，回族的生活水平一般要高于同村的汉族。但是在B村中回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没有任何矛盾，在村民中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既有回族也有汉族，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公共事务，也就是说不管对于回族还是汉族，B村都是这些村民的生活共同体，而对于回族清真寺的建设以及之后的宗教活动汉族村民也是很理解的。有意思的是，在清真寺办的儿童学习班中还有汉族的小孩子。可以说张XY是典型的中国社会的能人，在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下，能人在地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跟古代中国社会的乡绅有些类似。



孩子们在清真寺内学习

从B村回族的事例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村的回族社区出现了复兴的倾向，这是与城市中回族社区面临市场经济冲击而有可能解体的状况是相反的。而这可能也与农村地区政府行政能力下降有关系，特别是在远离北京的边疆地区。B村的很多活动都是由以张XZ为首的村民自己来决定的，这显示了很强的自治性，这在征缴水费的问题上B村与Y行政村发生冲突后而拒绝交费这件事上体现的很清楚。与其他很多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历史上回族就是

一个能够顺应和利用市场经济的民族，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很多回族成为了拥有一定资源的成功者。在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大潮流下，如果象张 XZ 这样热衷于重建本民族文化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回族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回族社会将会有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4 流动的穆斯林共同体——市场经济中的回族：以义乌的穆斯林为例

回族在历史上就是个善于流动善于在市场经济中抓住机会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与其它少数民族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回族穆斯林离开家乡向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流动，就像在前一节介绍的张 XZ 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中抓住了机会取得了成功。虽然随着城市改造一些城市里的回族社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回族人口在全国流动之中又形成了很多新的回族社区。据统计，2003 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为 1.4 亿人，而其中流动穆斯林的总数估计为 200 万人，之后还在不断增加。据王宇洁的估计，在 10 个穆斯林中就有 1 个穆斯林离开原来的生活圈成为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一员。关于中国穆斯林人口流动的特点，王宇洁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的聚居区，流动穆斯林与其他流动人口的来源明显不同，流出地主要是西北穆斯林聚居地区。大部分流动穆斯林来自西北比较贫困的甘、宁、青等省区，特别是这些省区的农村地区，他们向附近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或者向中东部、东南部发达地区流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西北地区虽然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并不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中部和西南部的一些省份外出流动的人口所占比例更大。第二，从民族来看，流动穆斯林中以回族穆斯林为主，其他几个民族的穆斯林所含比例很小。从一项就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流动穆斯林的调查发现流动穆斯林中回族人口的比例为 89.9%，维吾尔族为 4.8%，其余为其他民族，也包括汉族穆斯林。第三，流动穆斯林性别比比一般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男女性别比比较大。在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几座城市所作的抽样调查中，流动穆斯林中男性占 83.11%，女性只有 16.89%（王宇洁 2009：78-79）。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而回族人口的流动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省的义乌市，而且义乌的穆斯林人口的流动不光是中国范围内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从行政区划上讲义乌原本是隶属于金华市（地级市）的县级市，随着经济发展现已扩权为省直管城市。现在义乌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吸引了全世界的客商到这里批发商品，这其中就包括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各地的穆斯林商人。自 1982 年全国率先创办小商品市场以来，经过五易其址、九次扩建，义乌业已成长为世界有数的小商品集散地，其中有 11 个专业市场、20 多条专业街。市场总面积达到 260 万平方米，汇集了 41 个行业 40 余万种商品。市场经营户有 5 万余户。义乌市场商品已经出口到 212 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达 60% 以上。据义乌的官方估计，2006 年，义乌常住的外籍穆斯林有 8000 人左右。2007 年，义乌小商品市场 70%-80% 的客户都是阿拉伯人。可以说，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外国客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他们在义乌开办贸易公司，把大量中国的小商品销往世界各地。而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商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当地的社会。

近代以来义乌是一个没有清真寺，没有集中伊斯兰宗教活动，也没有穆斯林墓地的地区。1953 年义乌回族人口的统计数字为 2 人，1964 年 11 人，1982 年 19 人（郭成美 2007：

120)。义乌的巨大商机不仅吸引了大量外籍穆斯林商人也吸引了大量懂阿拉伯语、宗教信仰与饮食习惯与国外穆斯林相同的中国穆斯林,而其中最多的还是回族而且主要是西北的宁夏、青海、西南云南与中原的河南等地的回族。在这些回族中很多是懂阿拉伯语的翻译,在 2006 年,义乌市的阿拉伯语翻译 40%左右来自宁夏吴忠,人数在 1000 人左右。为了生活方便这些外来的穆斯林人口小范围聚居在一起,然后周围逐渐出现清真餐厅及清真超市,这又吸引来更多的穆斯林来居住。在从事翻译工作以外,以回族为最多的中国穆斯林也从事商业中介工作,为外籍商人提供翻译、订货、装柜、出关、提单的一条龙服务。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外贸公司或企业办事处,经营领域涉及五金、餐饮、仓储、外贸服装等等。还有不少穆斯林经营清真餐饮业和其他相关服务业。

在居住模式上义乌的穆斯林已经逐步出现小聚居的特点。根据马艳的考察,在义乌的穆斯林中国外穆斯林占 65%,本土穆斯林占 35%。从群体的行业分布来看,国外穆斯林主要是集中在外贸行业的老板阶层,本土穆斯林则大部分集中在外贸行业及清真餐饮和其他辅助或补充性行业的老板阶层,少部分处于贸易行业和清真餐饮业的老板阶层(马艳 2013: 116)。但是据清真寺的阿訇马春贞在首届中国宁夏回商大会(2008 年 9 月)的报告,在中外穆斯林 23000 人口中,中国穆斯林(包括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大约占 30%,其中回族人口约有 6000 人。而在这 6000 人中有一半是回商,是大小公司、商店、餐饮店的老板和企业家,还包括年收入可观的阿语翻译。可以看出义乌回族中商人的比例高是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也证明了中国回族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随着国内外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本来没有清真寺的义乌也新建了数个礼拜场所,这里包括由官方批准的清真寺和民间自行建立的活动场所。2000 年,在义乌的穆斯林外来人数总计 260 人。当时有两个自设的临时礼拜点,分别在宾王路新疆民族饭店和稠州路红楼宾馆。2001 年,随着市场的发展,在义乌设立的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公司有 20 多家,主要集中在红楼宾馆附近。同年,经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浙江省首处县级接纳国外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设在红楼宾馆设立。义乌市政府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特地赴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聘请马春贞阿訇为这一活动场所负责人,并将这位阿訇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义乌市。2002 年春季广交会期间,聚礼日人数猛增至 500 多人,红楼宾馆的礼拜场所当时只有 150 平方米,并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义乌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将原设在红楼宾馆的礼拜场所搬迁至南门街 200 号二楼,使用面积扩大到 600 平方米左右。同年 9 月,为确保广大中外穆斯林在义乌过好宗教生活,义乌市宗教局批准成立了义乌市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管理委员会。随着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2004 年 8 月,活动场所第二次搬迁,由南门街搬至江滨西路 90 号,占地面积约 20 亩,活动场所大殿的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据说可能容纳约 4200 人,在全国可居前五名。这个活动场所被穆斯林称为“义乌清真寺”或“清真大寺”。2005 年至 2006 年,来义乌的中外穆斯林增长速度更快,每逢周五主麻日,大约有 5000 人参加聚礼。到 2007 年 4 月,聚礼日人数已接近 7000 人,其中国内穆斯林占 40%,国外穆斯林商人分别来自也门、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马来西亚等国家。可以说大量的国外穆斯林的到来是义乌清真寺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据马强(2010: 82)的调查,截至 2007 年 8 月底,义乌共有包括清真大寺在内的各类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13 处。

关于义乌穆斯林社会的特点,王宇洁作过如下的总结。第一,经济收入平均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比如从宁夏吴忠来的阿拉伯语翻译的工资要比在家乡高很多。同时义乌也汇集了一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穆斯林。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初中或是高中教育,有在阿拉伯语学

校学习的经历，还有一部分人接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有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工作生活学习的经历。其次，自我管理和民主化程度高。义乌穆斯林社团有比较完备的自我管理制度，而且民主化程度相当高。2003年，义乌穆斯林经过民主程序组建了义乌伊斯兰教临时管理委员会，当时有成员5人，之后增加到11人。临时管理委员会现在已改称义乌市伊斯兰教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的成员由在义乌穆斯林社团中具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兼职，他们在工作之余为社团服务，不领取任何报酬。管委会主要负责清真寺日常事务，还组织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如向本地孤寡老人们送温暖献爱心，为受灾地募捐等。穆斯林在生活经商等各方面如果发生小纠纷，也通常会来找管委会调解。外国穆斯林在义乌遇到各种困难也会来找管委会协助解决，外籍穆斯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也通过管委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伊斯兰教管委会在财务管理方面也比较民主透明。它不仅负责对清真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还定期公布清真寺收到的乜贴、其他各项收入以及开支明细。义乌穆斯林社团的第三个特点是穆斯林文化自我意识强烈，宗教信仰虔诚，宗教活动的参与度高，对其自身权利也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义乌穆斯林的政治参与程度也较高。义乌市政协有穆斯林身份的政协委员4人，其中常委1人（王宇洁 2008：193-194）。

从以上的描述来看，义乌的穆斯林社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治功能，而清真寺在其中起到了中心的作用。市场化和全球化是促进世界的穆斯林向义乌移动的原动力，从无清真寺、无穆斯林墓地、无穆斯林宗教活动、无清真饮食网点的“四无”之地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义乌穆斯林社会的另一个大的特点是大量的国外穆斯林因为采购商品做生意聚集这里而使义乌的穆斯林世界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这和历史上的泉州等地有着相似之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过程的一环。可以说在义乌已经形成了超越国家的穆斯林跨国文化圈，而共同的宗教信仰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要素，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时也影响着当地社会。全世界的穆斯林因为经济利益而来到义乌，而在他们的“相遇”中，不知不觉地就要发生涵化，比如关于盖头与禁酒的共识与自律。由于义乌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所从事的中间贸易最大限度地在国外穆斯林采购商与义乌生产组织隔离开来，因此，其贸易活动更多的是在具有不同来源地和文化传统的穆斯林群体内部所进行的接触和互动。阿拉伯语是义乌中外穆斯林展开贸易互动的基本前提，所以才有大量的阿拉伯语翻译的市场需求。也就是说相对于穆斯林与当地人的相互适应，更重要的内容是穆斯林群体内部的文化适应，而这就是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义乌穆斯林中的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与他们整合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生活的共同体中（马艳 2013：123）。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中，义乌作为巨大的商品市场为这种文化适应既涵化的发生提供了场所与条件，所以很多学者会把义乌看成是当代的蕃坊。

小结

回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对于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回族才会历经磨难而生存发展到今天。尽管最中心的伊斯兰信仰没有改变，但是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已经因为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融合与涵化，已经具有了与中东阿拉伯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国家，所以回族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呈现不同的特征。由于人口相对较少，中国东中部的回族受到周围多数汉族的影响比较大乃至在信仰上出现了弱化的倾向。而在中国西北历史上出现的门宦现象也是因为接近中东阿拉伯地区

的地理位置与相对较多的回族人口，时至今日西部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还是非常虔诚的。作为拥有与主流文化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怎样与主流文化相处一直与其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回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境遇已经证明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但是在与主流文化的长期交流中，回族已经积蓄了很多经验与智慧具有了很强的生存能力。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可以说市场能力很强的回族面临着危机的同时也获得了重新认识与发展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契机。文中的云南农村地区与浙江义乌都证明了回族是善于移动善于在市场经济抓住机会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而这其中，伊斯兰信仰是支持回族适应各种环境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最强大动力。作为回族社区的中心——清真寺是对所有穆斯林开放的，在人口剧烈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它起到的联结作用也越来越大，异乡的穆斯林（包括外国人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都可以在这里祈祷、休息与相互交流，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开放的福祉空间，也是流动的精神社区。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不远将来，给人以心灵慰藉的宗教也许是最不可或缺的。

中国有着很长的中央集权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中央集权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国家利用单位制度及户口制度等可以说控制了全部社会资源以及资源的流动空间。由于政治因素，回族的伊斯兰信仰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被彻底地否定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善于流动的回族可以说又获得了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空间今后还会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社会空间逐渐扩大，回族也借着市场经济慢慢拥有了实力并且再确认了伊斯兰信仰归属之后，是否会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呢？是否会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悲剧呢？当然这些都有赖于国家政策的引导，也有赖于主流社会的包容，但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存在着各种的不确定性。回族作家张承志（1993：181）曾经说过，在中国回教与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限制与宽容间的微妙的平衡。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大一统观念极强的中国社会，作为坚持伊斯兰信仰的少数民族如何生存发展下去对于回族来讲始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难题。

参考书目

丁明俊 Ding, ming-jun 2009 西北苏非主义门宦形成与组织形态研究 Xibei sufei zhuyi menhuan xingcheng yu zuzhi xingtai yanjiu [A study on the System of School with Strict Classification of Sufism in Northwest and Its Organization]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Beifang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Beifang Ethnic University]第5期

段继业 Duan, Ji-ye 2001 论国家与回族社会的互动关系 Lun guojia yu huizu shehui de hudong guanxi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Hui society]. 回族研究 Huizu yanjiu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y]第1期

郭成美 Guo, cheng-mei 2007 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 Dangdai fanfang de jueqi -Yiwu musulin shequ fazhan licheng de chubu diaocha [The Rise of Fanfang in Nowadays—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f Muslim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History in YiWu City]. 回族研究 Huizu yanjiu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y]第2期

霍维洮 Huo,wei-tao 1996 西北回族社会的组织化历史运动 xibei huizu shehui de zuzhihua lishi yundong [Movement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Hui society]银川：宁夏社会科学 Ningxia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 in Ningxia].第5期

霍维洮 Huo,wei-tao 2005 近代西北回族社会二重组织及其演变 Jindai xibei huizu shehui erchong zuzhi jiqi yanbian [Northwestern Hui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西北民族研究 Xibei minzu yanjiu [Northwestern Ethnic National Studies].第3期

马启成, 丁宏 Ma,qi-cheng Ding,hong 1998 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 Zhongguo yisilan wenhua leixing yu minzu tese [China Islamic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馬通 Ma,tong 1989 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 Zhongguo yisilanjiao menhuan yu xibei musulin [China Islam Menhuan and northwest Muslim].西北民族研究 Xibei minzu yanjiu [Northwestern Ethnic National Studies]第1期

松本ますみ matsumoto,masumi 2000 中国イスラム新文化運動と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China Islam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National Identity].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3 ナショナリズム—歴史からの接近 [Struc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3 Chinese Nationalism: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Republican China]. 東京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马强 Ma,qiang 2010 市场移民与宗教的根植：义乌市伊斯兰教民族志研究 Shichang yimin yu zongjiao de genzhi [Market Immigrants and the Rooting of Religion: An Ethnographical Study on Islam in YiWu City] 回族研究 Huizu yanjiu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ies]第3期

马艳 Ma,yan 2013 从义乌穆斯林群体看跨国文化圈的共同体认同模式 Cong musulin qunti kan kuaguo wenhuaquan de gongtongti rentong moshi [Identities of Transnational Culture Circles Viewing from Muslim Communities in Yiwu City].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Beifang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第2期

王建新 Wang,jian-xin 2011 西北回族社会中的移民宗教组织与家庭—灵明堂固原分堂考察 Xibei huizu shehui zhongde yimin zongjiao zuzhi yu jiating —Lingmingtang Guyuan fentangkao [On immigrants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in the Hui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Guyuan Branch of Lingmingtang]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Beifang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第1期

王宇洁 Wang, yu-jie 2008 当代蕃坊：现状与未来 Dangdai Fanfang:xianzhuang yu weilai [Modern Fanfang—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首届中国宁夏回商大会文化论坛论文汇编 Shoujie Zhongguo Ningxia huishang dahui wenhua luntan wenhuibian [The First Time China Ningxia Hui Business Culture Forum Papers].

王宇洁 Wang, yu-jie 2009 2008 年中国伊斯兰教概况及对穆斯林流动问题的分析 2008 nian zhongguo yisilanjiao gaikuang jidui musulin liudong wenti de fenxi [A Summary of Chinese Islam in 2008 and an Analysis of the Migration of Muslim Population] 中国宗教报告（2009） Zhongguo zongjiao baogao 2009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eligions (20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杨华 Yang, hua 2012 城市化背景下的回族社会变迁 Chengshihua Beijing xiade huizu shehui bianqian [the Social Change of Hui undAer Urbanization]. 宁夏社会科学 Ningxia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第1期

张承志 Zhang, cheng-zhi 1993 回教から見た中国 [think China from Hui]. 中央公論社 tyuo kouron sya

周传斌, 马雪峰 Zhou, chuan-bin Ma, xue-feng 2004 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 Dushi huizu shehui jiegou de fanshi wenti tantao—yi Beijing huizu shequ de jiegou bianqian weili [A Paradigm Discussion on Social Structure of Urban Hui Muslim Minority:As the Case of Beijing]. 回族研究 Huizu yanjiu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y]第4期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 Zhonggong baoshan shiwei dangshi difangzhi gongzuo weiyuanhui 2009 保山年鉴 2009 Baoshan nianjian 2009 [Baoshan yearbook 2009].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nan minzu chubanshe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